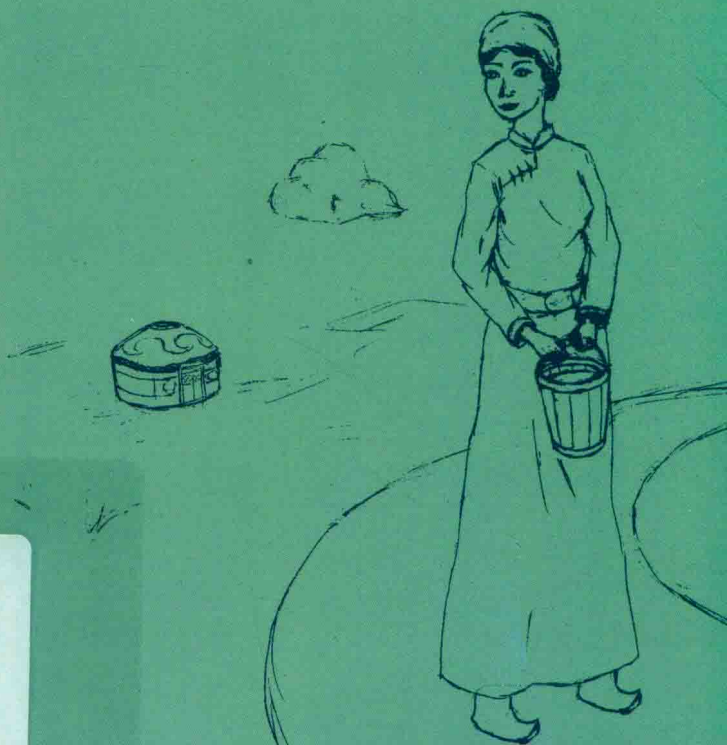


一个北京知青扎根草原的真实经历

我的路

连福兰 著 民族出版社



一个北京知青扎根草原的真实经历

我的路

连福兰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路：一个北京知青扎根草原的真实经历 / 连福兰
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9

ISBN 978-7-105-15667-2

I. ①我… II. ①连…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9194 号

策划编辑：孟 克

责任编辑：于玉莲

责任校对：许英姬

封面绘图：卓贝罕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mzpub.com>

印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数：90 千字 印张：7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4.00 元

ISBN 978-7-105-15667-2 / I · 2977 (蒙 489)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蒙古文发行科联系退换。

蒙古文发行科电话：010-58130904

自序

自从我退休之后，就想把我这个北京知青在草原扎根落户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写出来，但由于我的写作能力有限，难以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更谈不上是个人回忆录，只是以流水账的形式叙述出来，作为自己的人生记录。本书所写内容，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的经历，虽说有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我来说，那都是自己从上学到从首都北京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内蒙古草原生活工作的一段特殊而平凡的人生美好记忆，是我真诚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所积累的历史记录。

因为我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边远的草原牧区，看起来很辛苦，也吃了不少苦，但幸运的是在草原母亲的怀抱里我从一个不太懂世事的十几岁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会了工作，学会了生活，受到了锻炼，懂得了如何做人。我在当地领导和群众的关心及国家政策的照顾下，从当初的草原牧区的牧羊姑娘成为国家基层干部，到后来的四级高级法官直至退休，三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生之路，虽然会受到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但要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自己。对于一个具体的我们这一代既不幸又幸运的人来说，对于一个面对自己的命运和机遇的人来说，所走过的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脚印，是一步步经历了艰难困苦、努力奋斗走出来的人生之路，是用自己的汗水和辛苦铺就出来的成功之路。

所以，我永远自豪地说，我所走过的是一条追求美好向往，坚定人生信念，并为此付出行动和努力的路，一条充满阳光的路，一条无怨无悔的路。这就是我的路。

目录

自序	(1)
----------	-----

第一章 北京我的少年	(1)
------------------	-----

第二章 草原我的青春	(20)
------------------	------

第三章 爱在草原乐在草原	(74)
--------------------	------

第四章 成长在草原奋斗在草原	(129)
----------------------	-------

第五章 扎根草原情牵北京	(162)
--------------------	-------

后记	(217)
----------	-------

第一章 北京 我的少年

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父亲是满族，祖上在旗，清朝的时候也是吃俸禄的。随着清朝的灭亡，家道败落，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了。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共有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这四个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都具有自食其力、自立自强的品格。就是这种品格激励我在后来的生活道路中，克服各种困难，一次次经受住人生中的诸多考验，取得成功。



记忆中童年的生活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月坛公园附近。我1958年9月在北京市阜成门外一小（当时称阜成门小学）上的小学，学校离家比较远。1960年，为离家近，我转学到了我们院儿路西新建的月坛一小。那时候我弟弟已经5岁了，可他就是不愿意上幼儿园，只愿意跟在我后面当“小跟班”。母亲跟班主任商量后，允许我带着弟弟去上学，我上课的时候他就坐在我身边。弟弟很乖，也很听话，从来不给我添麻烦。9岁的我不仅带着弟弟上课，下课还负责回家做饭。那几年国家闹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我经常带着弟弟拿小筐捡菜叶子、葱胡子。记得有一次实在没捡到，我就爬墙翻到学校院里撸柳树叶和榆树钱儿，结果被老师抓住，罚站了很久。



好不容易戴上了红领巾（右三）

我的学习成绩一般，在班级里算中等，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加入少先队。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因为那几年为了帮助妈妈干些我们小孩儿能干的家务活儿，所以在学校里就没有机会帮助老师和同学，也很少参加学校课外活动，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很不会“来事儿”的学生，一直到小学毕业前夕我才加入少先队。

1964年9月1日，我就近上了月坛中学，被分配到一年三班，班里有54名同学，全是女生（我们那一届是男女分开编班的）。我的个子在班级里



算中等，坐在教室第四排，因为经常吃不饱，所以非常瘦。

上中学以后，我性格变了许多，从小学的沉默寡言到中学的开朗活泼；从小学的放学就回家到中学的积极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从小学的不管“闲事”到中学的乐于助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跟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上中学以后，除了爸爸每天起早贪黑地去上班外，妈妈也在街道缝纫厂上班，弟弟也上学了，生活条件好了许多，我也有充足的时间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成了班级的活跃分子。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这群刚刚升入初中的小丫头聚在一个没有异性的集体中，“疯”是在所难免的。初一时班主任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老师，根本管不了我们这群疯丫头，时常被我们这帮调皮的丫

头们气哭。她好像是南方人，讲话口音很重，对学生的名字总是叫不清楚，我的名字她叫不好，同学们总是把连福兰听成“棉花团儿”，于是“棉花团儿”就成了我的绰号。这个绰号一直伴随我到插队离开北京。

上初二的时候学校安排了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男老师到我们班当班主任，疯了一年的丫头们，见到一个既严肃，又平易近人的异性老师都收敛了很多。尤其是我，上课也听讲了，学习也用功了，成绩也提高了。老师还让我当了班干部，使我感觉莫大的荣耀。

学校的集体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我和我们班的翟建月同学还是学校合唱团和鼓号队队员呢。合唱团在每年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时都上台参加演出，还受到过表彰。在鼓号队我负责敲小鼓。每次有大型的活动，我们鼓



号队总是排在最前面，穿着学校为鼓号队配发的运动服，可神气了。记得那年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全校学生到外国大使馆区进行抗美示威游行，我们鼓号队也不例外，瘦小的我背着鼓敲一路，每次一个来回都有二三十里地。胳膊疼、腿酸都是次要的，肩膀和胯骨都磨出了水泡。可我自己根本没觉得苦，反而乐在其中，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再苦再累也能忍受。

好景不长，1966年4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成立了很多的红卫兵组织。我因为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在学校表现也不错，所以和我们班的班长等同学一起参加了学校里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当时感到很光荣。为了“破四旧”，把我的名字也改了，叫“连卫兵”。

1966 年五六月份开始大串联，要是学生，不用花钱买火车票，到指定地点领一张乘车证就可以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了。因为我哥哥 1965 年就去上海当了兵，我很想他，就打算借机去一趟上海。我和同学一起挤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由于上车的学生太多，没地方坐，我们就钻到椅子底下睡觉。记得火车到了南京还上了轮船过长江，对于从未出过北京城的我，去往上海的火车仿佛走了好长时间。

好不容易到了上海，我们先去了一个学校，简单的看了看大字报，我就拿着地址去找正在那里服兵役的哥哥。哥哥那时候可神气了，穿的是空军军装，腰间挎着手枪，英俊潇洒，我羡慕极了，下决心也要当一名保卫祖国的军人。他那时候每个月才 6 块钱津贴费，一下子就给了我 5 块。那个年代的 5 块钱顶现在的 500 块花。



拿到这 5 块钱，把我美得够呛，家庭生活困难的我什么时候拿过这么多钱哪！抓着钱的手放到裤兜儿里不敢撒开，生怕丢了。和哥哥分手后，我就赶紧跑到商店买了一双草绿色的球鞋和一双袜子，就在那个年代是最时髦的了。因为当时我穿的是一双挺破的妈妈自己做的鞋，根本就没有袜子。那天买完我想买的东西，好像还剩了一块多钱。在上海吃住、坐车都不花钱，我们几个同学稀里糊涂地又去了几个学校，看了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就回到了北京。

到学校里一看，越闹越不像话了，把校长给斗死了。我们班主任老师由于出身不好，也要挨斗，非得让他承认所谓的“罪行”。那么平易近人、知识渊博的好老师，转眼就变成了被斗对象，让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学生无法理解，我们几个班干部还因为揭

发老师不积极，也要陪着老师站着，我感到非常气愤，但是不敢不服从他们的“革命行动”。学校的“革命行动”从斗校长斗老师渐渐发展到斗班干部和学生，乱成一团，也没法上课了。看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乱，我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了，心里感到有点害怕。

就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有同学组织大家去另一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定县参加农业劳动，以摆脱不上课搞运动的苦闷，很多同学都积极参加了。我们分别住在农民家，挨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农民们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姑娘们可好了，不论到谁家都设法给做最好吃的。吃得最多的就是粉条，好像是他们用某种树皮加点儿别的东西轧成的，虽然吃起来有些牙碜，但很好吃，在北京从来没吃过。农民家里跳蚤很多，一到晚上睡觉的



时候就出来咬人，我也被咬得浑身都是包。很多同学被咬得实在受不了，都陆续返回了北京，最后只剩下我和谷志斌两个人。我们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晚上和村里的年轻人聊天儿。劳动虽然辛苦，但苦中有乐。有时候饿了就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偷着掰玉米棒子，在玉米地里捡些柴火点着烤着吃，吃得嘴和脸都是黑的，我们互相指着大笑一气儿，无忧无虑，每天都很开心。我们俩虽然才15岁，又是女孩子，但都以坚强的意志一直坚持到1966年8月中旬，我们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去定县接我们，说北京有重要活动要我们俩参加。

老乡们得知我们俩要走，很舍不得，村里的年轻人自发送我们到定县县城，县妇联主任听说后也为我们俩送行，我们还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张相，